

中國文哲專刊 22

# 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史

陳友冰 印



(1949-2000)

下冊

陳友冰◎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中國文哲專刊 22

# 海峽兩岸 唐代文學研究史

( 1949 - 2000 )

下冊

陳友冰 著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中國文哲專刊 22

## 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史 (1949 - 2000)

著 者 陳友冰

發 行 者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臺北市南港區研究院路2段128號  
電話：(02)27899814；27883620

排版印刷 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內湖區瑞光路583巷25號1樓  
電 話：(02)26579211

定 價 (上、下冊：精裝)新臺幣780元  
(上、下冊：平裝)新臺幣700元

初 版 中華民國 90 年 10 月

掃描二刷 中華民國 93 年 12 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ISBN 957-671-801-5 (全套：精裝)

ISBN 957-671-802-3 (全套：平裝)

## 第三章 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比較

### 第一節 兩岸唐代文學研究的相似與共通

海峽兩岸五十年來壅塞阻斷、缺少溝通，由於政治思想和學術背景的不同，兩岸的唐代文學研究也形成了各自的優長和存在着不同的缺憾。但中國畢竟只有一個唐朝，也只有一個唐代文學，何況又來自同一個學術傳統，因此又有許多相似和共通之處：

#### 一、兩岸唐代文學研究皆爲一方重鎮，都是古代文學研究中熱門話題

據臺灣方面的有關資料<sup>①</sup>，一九六〇至一九九四年三十五年間，臺灣各大學研究所古代文學博士論文中，研究古典詩詞的共一百二十篇，其中唐五代爲三十一篇，占百分之三十五，其中臺灣政治大學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九年的十篇古典詩詞方面的博士論文，唐代詩詞爲七篇，占百分之七十；一九五五至一九九四年四十年間，臺灣各大學研究所研究古典詩詞的碩士論文爲六百八十

① 彭正雄、彭雅鈴：〈臺灣地區古典詩詞研究學位目錄〉，《漢學研究通訊》，56、57、58期。

一篇，其中唐五代二百一十篇，占百分之三十一，這當中還未包括唐人小說、散文、駢賦和敦煌變文之類選題。另外，從一九七五至一九八四年十年間獲「國科會」獎助的古代文學方面的論文共一百零四篇，其中隋唐文學為三十七篇，占百分之三十五。

大陸的唐代文學研究，根據中國版本圖書館已出版的《全國總書目》，一九八一至一九八九年在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各個史段的研究專著中（不包括選註和鑑賞），唐代文學段占的比例如下：

| 年份   | 古代文學其他史段總數 | 唐代文學段 | 唐代文學所占比例 |
|------|------------|-------|----------|
| 1981 | 16         | 7     | 43%      |
| 1982 | 15         | 2     | 13.3%    |
| 1983 | 17         | 8     | 47%      |
| 1984 | 42         | 8     | 19%      |
| 1985 | 31         | 7     | 22.5%    |
| 1986 | 41         | 11    | 26.8%    |
| 1987 | 27         | 4     | 14.8%    |
| 1988 | 20         | 8     | 40%      |
| 合計   | 209        | 55    | 26%      |

除了一九八二和一九八五年，《文心雕龍》的專著略多於唐代文學外，其餘各年份以及總數，皆以唐代文學研究的專著為最多。

兩岸當代的古代文學資料整理和索引編目工作，也是唐代文學起步較早。大陸岑仲勉的《元和姓纂四校記》成於一九五四年，吳文治的《古代文學研究資料·柳宗元卷》成於一九六四年，臺灣嚴耕望的《唐尚書仆射表》成於一九五六年，羅聯添的《唐代文學論著集目》成於一九七八年。在古代文學各個史段以

及作家、作品研究會中，兩岸的唐代文學研究會成立的最早，大陸的唐代文學研究會下屬的作家、作品研究會也最多，也是兩岸古代文學各研究會中出版年鑑、會刊、研究集刊最早、持續時間最久的一個學會。

## 二、研究歷程中都發生過傳統研究方法與新觀念、新方法的碰撞，並產生相近的趨歸

二十世紀初，西風東漸，中國傳統的治學道路與新的文學觀念和方法產生了第一次碰撞，在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王國維、梁啟超、劉師培這批國學大師，曾嘗試着把文學從經學中剝離出來，首次把文學作為一個獨立的本體和學術系統來加以思考和詮釋。在方法論上，則以社會學、美學、史學的研究方法來改造傳統的註疏、訓詁、考據之學：或是參用西方美學理論來詮釋中國古典詩詞和作家的創作活動；或是抬高經學所未論及的小說、戲劇來強調「文學與群治」的關係；或是用「知人論世」的史學演繹來構建中國古代文學史。大師們的這種嘗試，經過胡適、聞一多、魯迅、朱自清、蘇雪林、臺靜農這批後繼者的努力，終於完成了中國古代文學研究向近代化的演變，並成為現代唐代文學研究的開創者和奠基人。五十年代後，儘管兩岸分治，但在他們傳人的努力下，唐代文學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的變革也從未停止過，而且幾乎在同一時段，發生過較大的思想碰撞。

五十年代中期，臺灣當時新儒學代表人物徐復觀在研究中國古典詩詞時，有意學習王國維，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揉進西方的文藝觀和方法論，例如他把陶淵明、李白、杜甫作為三種類型的代表來討論中國古典詩詞中的「隔」與「不隔」。五十年代末，陳

世驥通過與西方悲劇觀的比較來解析杜甫的《八陣圖》等中國古典詩詞的情感特徵（《中國詩之分析鑑賞示例》見《文學雜誌》，1958年第6期），施淑女則用西方神話中的原型批評來解讀《楚辭》中的「天問」、「九歌」等篇（《臺灣大學文史叢刊》，1958年）。到了六十年代，一批古代文學的學位論文更著重於新的研究方法的運用，如許世旭的《李杜詩比較研究》（臺灣師範大學碩士論文，1963年），葉光榮的《宋代江西詩派研究》（中國文化大學碩士論文，1968年）等，這種對傳統研究觀念和研究方法的不斷撞擊終於導致了七十年代初的一場關於「新批評」方法的大辯論。這場辯論，分別以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葉嘉瑩和外文系教授顏元叔為代表，於一九七二年在《中外文學》上展開，很快吸引了眾多的古代文學研究者和一批學術刊物的關注和加入。爭論的焦點是「新批評」的研究方法是否適應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這場爭論正如後來呂正惠等人所總結的那樣，與其說是辯論新批評是否適合中國古代文學研究，還不如說如何去適應古代文學研究<sup>①</sup>。因此，這場爭論不但沒有阻遏新批評等研究方法的引進，相反卻使更多的學者開始審視本已習以為常的傳統研究方法，促使新的研究方法與中國古代文學研究更好地結合，就連葉嘉瑩的學生，也開始把葉氏在古代文學研究中著重於意象、結構、語言的細膩分析與新批評方法進一步結合起來。在此時段，文學的比較研究也逐漸興起並發展起來。一九七〇年臺灣比較文學學會成立，同期，臺灣大學成立比較文學研究所博士

① 呂正惠：〈新法看舊詩〉，《中國文哲研究回顧與展望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2年5月）。

班，臺灣的比較文學研究有了自己的組織和人才基地。一九七二年，《中外文學》創刊後，又為「中華民國比較學會」開闢專欄，凡涉及比較文學的一些課題如比較文學的理論介紹、範疇定位、平行研究、類比研究和影響研究等研究類型、回顧展望等皆以此為窗口得以討論和展開。經過十年的積蓄，到了八十年代，終於集結成一批有分量的比較文學專著。其中葉維廉起着開創和奠基作用。他認為：完全拋開中國文化傳統去套用西方文藝概念意義不大，「他不能引我們進入更深一層的文化交融領域」。作為一種有效的研究方法，「必須兼及兩方傳統文化中歷史的延伸態及美學結構」<sup>①</sup>。七十年代唐代文學碩博士論文中，出現了大量的比較文學課題和比較研究方法，如李豐楙〈魏晉南北朝文士與道教之關係〉（政治大學1977博），金周淳〈陶淵明文學與韓國時調之比較研究〉（臺灣師大1979博），陳端端〈劉勰、鍾嶸論詩歧見析論〉（輔仁大學1971碩），宋丘龍〈蘇軾和陶詩之比較研究〉（東海大學1976碩），陳申君〈清三家詞比較〉（東海大學1973碩）等，與此時比較文學理論和研究方法的推展是不無關係的。

此時在臺灣古典文學研究中影響較大的，還有從西方引進的結構主義和原型批評。結構主義的倡導者有楊牧、周英雄、鄭樹森等人。首先採用神話原型批評來研究古典小說話民間故事的是侯健、張漢良。這兩種新的研究方法在當時的學術界尤其是青年學者中產生了較大的影響，以臺大中文研究所為例，七十年代末以後的碩博士論文有陳芳英的〈目蓮救母故事之演進及其有關文

<sup>①</sup> 葉維廉：〈東西比較文學模子的應用〉，《中華文化復興月刊》，4卷5期。



學之研究》(1978碩)，梁美清的〈梁祝故事及文學研究〉(1982碩)，洪淑苓的〈牛郎織女研究〉(1987碩)、〈關公民間造型研究〉(1994博)等採用結構主義或原型批評方法的碩博士論文，正是建立在上述的古典文學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變革的基礎之上。到了九十年代，以龔鵬程為代表的臺灣中生代後期學者和以周慶華、連文萍、趙孝萱等為代表的新生代學人更是以此為起點，對傳統的研究方法發出更激烈的批評，並開始思考構建古代文學研究新的理論體系<sup>①</sup>。

五十年代初，隨着新中國建立後展開的思想改造運動，大陸的古代文學研究也發生了一場研究觀念和方法的變革，這場變革的聲勢和深度遠非五十年代的臺灣可比，而且目標非常集中和單一，即用「人民性」的政治標準和「現實主義」的藝術標準來重新評價古代作家，重新解釋古代作品和文學現象。由於極左思潮的盛行，這種改造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演變成否定傳統文化的民族虛無主義和對堅持自己學術觀點的研究者的政治大批判，因而受到過來人和文學史家的非議。但也不可否認，當時留在大陸的學者中，對這種「脫胎換骨」也有着某種真誠，他們懷着對新中國未來的期待和對馬列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的新鮮感，也想去適應，也想去嘗試，把這種新武器運用到自己的學科領域中去。五、六十年代大陸古代文學界幾次規模較大的、接近學術意義的討論，都是圍繞着如何用「人民性」、「現實主義」這種新的觀

---

<sup>①</sup> 龔鵬程：〈年輕一代的古典文學研究〉，《幼獅學刊座談會論文集》，1992年；周慶華：〈九十年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概況〉，趙孝萱：〈五、六十年代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概況〉《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1年）。

點和方法來重新解釋古代作家作品，如「怎樣看待古典文學中的現實主義」？「如何評價民間文學」？以及關於《水滸傳》、《三國演義》、「長恨歌」主題等有關問題的爭論，都是在這個背景下出現的。我認為：如果否認和掩蓋思想改造運動和政治大批判給幾代知識份子所帶來的傷害固然有違歷史的真實，但如無視當時知識份子中求新求變、力圖嘗試學習運用馬列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來解決古代文學中的問題，也是不夠客觀、公正的。

「文革」以後，隨着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和加深，古代文學研究領域的傳統觀念和方法又一次受到了挑戰，一九八三年召開的「中國古典文學宏觀研究討論會」則是一個標誌。這年七月，大陸古典文學方面的權威刊物《文學評論》、《文學遺產》和《天府新論》、《語文導報》等觀念較新的刊物，聯合在杭州舉辦了這次討論會。會上對改變傳統的研究觀念和單一的研究方法的種種努力和嘗試給予了肯定，對宏觀研究的任務、特徵、方法以及存在問題進行了分析和探討。這次會議的共識是：所謂宏觀研究，就是要從傳統的作家作品論進入對一個文學階段或全過程的把握，總體或部分演進規律的探討。在方法上，則要求從箋註、考辨走向多學科交叉和心理行為的探求。如果把大陸的宏觀研究與臺灣的新批評之爭作一比較：新批評的提倡者由於自身的缺陷，研究成果並不豐厚，只能算一次嘗試，並未形成氣候；大陸的宏觀研究在當時儘管也存在着理論準備不足、運用上沒有很好地消化吸收等弊端，但它發生在國門幾十年封閉之後的思想解放之初，首先是敢於進行嘗試的理論勇氣就應該肯定，而且在此以後基本上形成了一支力量，當今已成為古代文學研究中一種重要手段，有不少力作問世，如余恕誠的《唐詩風貌》，趙克堯的

〈盛唐氣象論〉，傅紹良的《盛唐文化精神和詩人人格》等，並已有人對此進行學術史方面的研究，如孫立的〈近十年唐宋詞宏觀研究述評〉（《學術界》，1991年第5期）。八十年代躋身於唐代文學研究領域的一些年輕學者，如董乃斌、傅紹良、李浩、程國賦、蔣寅等人，也都是以他們採用新視角或新方法的論著，從而奠定了他們在唐代文學中的研究方向和學術地位的。

進入九十年代中期以後，面臨着世紀之交的社會轉型，兩岸古代文學要求變革的呼聲皆遠遠高於其他學科，兩岸的有識之士都在總結百年來古代文學的研究歷程，思考如何加強學科建設來應變，以求得在新世紀中更好地生存和發展。大陸方面如胡明的〈關於唐詩——兼談近百年來的唐詩研究〉，徐公持〈二十世紀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近代化進程略論〉，董乃斌等人〈關於二十世紀唐代文學研究的對話〉，王兆鵬等〈跨世紀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走向筆談〉，葛曉音〈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現狀的衡估與思考〉；臺灣方面的有龔鵬程主編的《五十年來的中國文學研究》（學生書局，2001年），對臺灣近五十年來的古典文學研究概況，文學史、文學資料及目錄文獻整理，域外漢文小說，學會運作情況皆一一作了回顧總結，探討其成就與不足，對發展趨勢進行展望。羅宗濤亦在主持《臺灣五十年來臺灣中國文學研究》這個「國科會」課題，集合陳文華、何寄澎、簡宗梧、林玫儀等專家，分文體對臺灣五十年來的古典文學研究的得失進行檢討。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自一九九八年起，就「世變中的中國文學」開過六次研討會，歷時兩年，分析中國古典文學研究的現狀與出路。《中國文哲研究集刊》則出專集，對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進程進行回顧與展望。

### 三、都有一批學術帶頭人、學術機構、學術刊物在致力於學科建設

五十年代以前，聞一多的《唐詩雜論》和陳寅恪的《元白詩證稿》開啓了從民俗學和以史證詩兩條途徑來研究唐詩的新思路。進入八十年代後，傅璇琮的《唐代詩人叢考》和程千帆的《唐代進士行卷與文學》又成爲新時期考論型和多學科結合的範例。此後，在唐代文學研究的各個方面都出現了一批帶頭人，寫出了一批頗有價值的論著。在史料考辨方面，有傅璇琮、郁賢皓、陳尚君、陶敏、吳在慶等；全集、別集的箋註、集註方面，有詹鍈、錢仲聯、劉學鍇、余恕誠、朱金城等；資料彙編、索引方面有傅璇琮、陳伯海、周祖謨、周勛初、裴斐、吳企明等，專論方面有陳貽焮、鄧紹基、葛曉音、鍾優民、陳鐵民、王拾遺、卞孝萱、閻琦、王小盾、張明非、戴偉華、莫礪鋒、張伯偉等；唐詩通論則有余恕誠、蔣寅、葛曉音、尚永亮、杜曉勤等；文學史和唐詩學方面有傅璇琮、袁行霈、羅宗強、楊海明、許總、陳伯海等；散文方面的孫昌武、吳文治等；唐五代詞方面的吳熊和、楊海明、王兆鵬、劉尊明等；唐人小說方面的李劍國、李時人、程國賦等；敦煌文學方面的項楚、白化文、張鴻勳、張錫厚等。

在唐代文學的學科建設上，一些負有使命感的專家學者對唐代文學研究現狀、發展趨勢不斷地在思考和建議，它對大陸唐代文學研究的健康發展和深入起着保證和導向的作用。

臺灣方面阮廷瑜的《高常侍詩校註》、《岑嘉州詩校註》，在六十年代爲臺灣開啓了考據箋註之風，一九六七至一九八〇年

十四年間，就有十六部博碩士論文採用了這種箋註式。羅聯添和王更生則分別代表了考論型和賞論型這兩個唐文研究流派，其門人王基倫、方介、呂武志等分繼其後，各有專精。羅氏的《韓愈研究》則是臺灣唐文研究的問鼎之作。他的《唐代文學論著集目》以及他主編的《中國文學論著集目》（正續編）則集唐代文學資料索引之大成，很受海內外學者看重。王夢鷗的四集《唐人小說研究》奠定了他在臺灣唐人小說研究中的開山地位。他的後繼者王國良、李豐楙、黃景進亦各有傳承，甚至有後來居上之勢。王氏的《初唐詩學著述考》則直接開啓了臺灣唐詩學研究，蔡瑜的《宋代唐詩學》，高大鵬的《唐詩演變之研究》皆繼其後塵。另外，象羅宗濤的敦煌學研究，李豐懋的道教與唐詩研究，蕭麗華的禪學與唐詩研究也都是該學科的前沿。

在學術組織方面，大陸的「中國唐代文學學會」及其下屬的各研究會，臺灣的「中國唐代學會」、「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有着很好的交往，它們既是兩岸學人聯繫的紐帶，又是兩岸唐代文學研究溝通的橋梁。它們的「會刊」和「年鑑」有個共同的特點：既注意介紹對方的研究成果，又能較客觀地品評其得失，以及較及時地報道雙方的研究動向和一些學術會議的述評。

在出版方面，大陸的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及巴蜀書社、齊魯書社等一些省級出版社，臺灣的文史哲、萬卷樓、學生、學海、三民、里仁、文津等書局在推動古代文學的學術研究、引導研究方向、資助學術著作、團結學者、扶植後進等方面皆有較好的口碑。如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出版唐代詩文大家別集同時，又有計劃地出了一套「唐詩小集」，專門研究歷來忽視的二、三流作家，並編輯出版了《續修四庫全書》；臺灣方面如文

史哲出版社的「文史哲學集成」，文津出版社的「隋唐文化研究叢書」、「大陸博士論文叢書」，學生書局的「書目季刊」、「中國文學研究叢刊」，國立編譯館主編的「歷代詩文集校註」等都較好地起到了上述作用。

#### 四、兩岸的學術溝通和交流已經啓動，並在逐漸擴大和加強

兩岸的唐代文學研究，出於同一個研究對象，有着同一個文化傳統，又面臨着一些共同性的問題，只是由於五十年來的阻隔，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形成了社會文化上的差異，也給兩岸學者的研究觀念和研究手段帶來異趣。只有加強溝通和交流，才能互相取長補短，形成合力，使唐代文學研究拓寬和深化，合力解決我們所面臨的共同問題。對此，兩岸的學者都有着清醒的認識。大陸的中國唐代文學學會一九八三年出版的第一期《唐代文學研究年鑑》，就刊登了王學泰的〈臺灣出版的《杜詩叢刊》簡介〉。大陸的唐代文學學會會長傅璇琮對促進兩岸唐代文學研究的溝通交流，更是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並做了許多實際的工作。最近，他就和臺灣唐代學會前會長羅聯添共同主編一套八卷本的《當代中國唐代文學論著提要》，將近五十年來海峽兩岸唐代文學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和論文，以提要 and 節錄的形式收錄其中，兩岸各有五位唐代文學專家參加編選和撰寫，這也是兩岸學者首次攜手合作來編寫唐代文學研究專著，因此無論從著作的內容還是操作的形式上，都會加強兩岸唐代文學乃至整個學術文化界的合作和交流。臺灣學者對兩岸溝通和學術交流的看法可以李豐楙為代表（他也是八卷本的《當代中國唐代文學論著提要》的副主

編，臺灣方面的執行人），他在一篇關於民間文化的論文「結語」中寫道：「在中國文化的傳統之下，不同地區有些是相通的，有些則會有地域性的差異」，「當前隨着大陸在文革後所採取的逐漸開放政策，彼岸的學界也開始思索「民間文化」問題。由於大陸所存在的問題，與臺灣所見的互有異同，而且由於社會文化在五十年來也漸有差異，加之學者所受的訓練也各有異趣，因而臺灣的民間信仰所反映的『民間文化』，仍需本地學者自己嘗試加以解決，然後才能進行比較研究」<sup>①</sup>。承認共同的文化傳統和研究中「同」的一面，也看到五十年的阻隔和地域形成的差異；既強調交流比較的必要性，又強調自己着手來研究解決，這種言論可以說代表了臺灣相當一部分學者的看法。

如前所述，這種交流和溝通，實際上在六十年代末就已開始，但走上臺面，半公開乃至公開進行，臺灣方面則是在一九八七年政治解嚴以後。走在最前面的是萬卷樓書局的《國文天地》、漢學研究中心的《漢學研究通訊》和中國文哲研究所的《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等刊物。萬卷樓書局及其屬下的《國文天地》雜誌社在兩岸學術交流和溝通方面的表現，在本書的第二章已做了介紹。《中國文哲研究集刊》自一九九一年三月創刊時起，就很注意對大陸文哲著作的評介和研究，如創刊號上就發表了邱燮友的對劉大杰和葉慶炳兩種《中國文學史》的比較研究。隨後幾期，則陸續發表對大陸學者湯志鈞、張立文等評介和王兆鵬、周祖譔等的來稿。《漢學研究通訊》從一九九三年起，開始

① 李豐楙：〈道教與民間文化課題研究計劃·結語〉，《中國文哲研究回顧與展望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1992年）。

系統地介紹包括唐代文學在內的大陸漢學研究成果，如黃寬重的《典籍增輝——中國大陸學界整理宋代典籍回顧》，高度評價了大陸近年來宋代典籍尤其是詩文集的整理成果。由大陸的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與臺灣「漢學研究中心」於一九九六年四月在臺北舉辦的「兩岸古籍整理學術研討會」，是近年來兩岸學術交流中，大陸學者陣容最強大、交流最充分的一次盛會，大陸方面有二十八位學者參加，在會上發表了二十八篇關於古籍整理方面的論文，在臺灣學術界產生了很大的反響。

大陸的古典文學資料和論著，以及大陸學者在其中嘗試的新的學術觀點和研究方法，對臺灣學者產生了一定的影響。第二章中所列舉的楊文雄《李白詩歌接受史》、尙永亮《元和五大詩人與貶謫文學考論》、連文萍《明代詩話考述》、游志誠和周彥文的有關論述就是明證。

大陸學者對臺灣古代文學研究的評介以一九八九年盧興基編選的《臺灣古代文學論集》為標誌，當時可以說是一個視窗，不少學者是通過這本書來認識和評價當代臺灣古代文學研究的。在此之後，《唐代文學研究年鑑》、《文學遺產》、《社會科學述評》、《學術動態》等刊物開始不定期地介紹臺灣古代文學研究現狀，一九九二年，傅璇琮在《中國典籍與文化》創刊號首次對羅聯添的《唐代文學論集》等學術專著進行了專題介紹。但從整體情況來看，大陸學術界對臺灣古代文學研究現狀瞭解得還很膚淺，總體上還停留在介紹動態、會議述評這個層次上，臺灣學者的一些代表性的論著甚至還沒有見到，當然談不上對此深層次的分析和研究趨向的總體把握了。例如一九九一年的《唐代文學年鑑》，首次在「海外研究動態」專欄介紹臺灣唐代文學研究動



態，全文不到二百五十字，亦未提及具體的研究者和論著；一九九一年三月《社會科學述評》刊載署名「樂耕」的《十年來臺灣古代文學研究概說》，是較早評介臺灣古代文學現狀的一篇綜論，可能是作者不太熟悉臺灣古代文學現狀，評介中輕重、主次的把握，或失衡，或遺漏，或錯誤，說明大陸學者對臺灣的唐代文學乃至古典文學研究現狀還較陌生。

另外，由於兩岸沒有三通，缺乏正式溝通交流動渠道，因此兩岸的學術往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仍處於無序狀態。造成了盜版書盛行，研究者對大陸資料佔有和使用上的不平等，助長了年輕學者炫耀獵奇和抄襲等不良學風，從而引起一些學者的不滿並提出批評。筆者在第二章對此已作論述和列舉，可以參見。另外，由於資訊不通，兩岸學者在選題上時有撞車，造成一方面是尚有許多領域急待開發，一方面在進行重復勞動，而且雙方對此課題的資料、研究成果也無法及時交流互補。前面提到的朱金城、羅聯添的兩種《白居易年譜》是一例，阮廷瑜、王定璋的《錢起詩集校註》又是一例。阮氏在該著的「序」中說：在一九九三年二月的一次會議上，「王國良教授送我王定璋校註的錢起詩集，是一九九二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由於資訊不足，我與王定璋先生竟同時在兩岸各自校註同一人詩集。王先生是先我著鞭，既知有先問世之作，自謂醬瓶上物耳」<sup>①</sup>。類似的情況還有：大陸學者于天池〈論唐代小說的發達與行卷無關涉〉（《文學遺產》，1987年第5期）與臺灣學者羅聯流的〈唐代文學史兩個問題探討〉（《書目季刊》，11卷3期，1985年）關於唐人小

<sup>①</sup> 阮廷瑜：〈序〉，《錢起詩集校註》（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年）。